



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推进理论创新

□ 周文彰 岳凤兰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既需要紧紧“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坚持问题导向，也需要我们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是因为：

第一，传统文化是土壤。中华民族创造的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作为先在的精神环境，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之树的深厚土壤；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就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之中，既具有深厚历史渊源，又具有广泛现实基础；既体现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离开了这块土壤，再好的理论也无法立足，更无法扎根。离开了这块土壤，愿望再好的理论创新，也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必须扎根于中华文化的沃土；抛弃传统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

第二，传统文化有营养。传统文化当中博大精深的思想、智慧、方法等等，是先人留给我们的丰厚的精神营养。所以习近平总书记要求领导干部以学益智，以学修身。同样，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也必须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中吸收营养。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厚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深厚滋养。“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和意义给予的高度凝练的总结评价。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离开了传统文化的滋养，理论创新是没有生命力的。

第三，传统文化给力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是中华民族能够五千多年生生不息的重要源泉，当然也是我们一百多年来追寻中国梦的精神动力。一个民族的创新和发展能力、交往和治理能力以及其他各种能力，是与这个民族的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息息相关的。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说到，我们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由我国独特的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决定的。今天，我们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当然要学习和借鉴各国人民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但最不应该忽视的是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以增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造力、传播力、感染力、影响力。

因此，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必须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求从中获得肥沃的土壤、丰富的营养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当然，我们还必须深刻认识到，传统文化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受到当时人们认知水平、时代条件、社会制度的局限性的制约和影响，因而也不可避免会存在陈旧过时或已成为糟粕性的东西。这就要求我们在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同时，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需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态度，结合新的实践和时代要求进行正确取舍。

第一，要以理性科学的眼光审视自己。首先，审视自己必须要理性、客观、科学地“研究自己”。要理性地研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刻内涵，准确评价价值意义；客观地研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重要作用，准确辨别优劣成分；科学地研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基因，准确判断发展动力。审视自己的目的在于准确定位，因此还必须具备战略思维和世界眼光。只有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研究紧密联系在一起，放在时代发展和世界发展格局的大背景之下，才能更好地辨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强项和短板、精华与糟粕，才能更有信心和力量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服务。

第二，以求真务实的态度自我完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对传统文化进行科学分析，对有益的东西、好的东西予以继承和发扬，对负面的不好的东西予以继承和发扬，对负面的不好的东西加以抵御和克服，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而不能采取全盘接受或者全盘抛弃的绝对主义态度。这就要求我们在明确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和定位、明确了其中的精华与糟粕基础上，还要以求真务实的态度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自我完善。在此过程中，需要观照文化固有的本质特征。一是传统文化作为文化系统所具有的排异性。没有排异性，文化就没有定力，就失去了稳定性。但是这种排异性如果体现在对外来文化的绝对否定上，就会固步自封，制约发展。二是传统文化体现文化特质所具有的同化性。文化的同化体现为积极和消极两种形式。在学习和接受新理念、新观点、新事物时，消极的吸收与同化往往

会体现出“生吞活剥”的教条弊病。三是传统文化作为文化定势所具有的惯性和惰性。传统文化长期浸润和传承而形成的文化定势，使人们在分析和解决问题时难免带有一定的倾向性。在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自我改造和完善时，为了克服文化的固有特征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必须坚持求真务实的态度和作风。求真务实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对其认识论的精神实质的精辟概括。以求真务实的态度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自我改造和完善，这也是为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必然要求。

第三，要以与时俱进的精神守正出新。新时代对中国的发展提出了新要求，需要进一步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需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与时俱进的精神守正出新。邦虽旧邦，其命维新，具有五千多年悠久历史文化的古老中国始终具有求变求新的精神气质。而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始终站在时代前沿。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征，马克思一再告诫人们，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指南，必须随着实践的变化而发展。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团结和带领全国人民取得了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成就，使马克思主义深深地扎根于中国。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只有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我国具体实际、历史文化传统、时代要求紧密结合起来，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总结，才能把蓝图变为美好现实。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指南，必须长期坚持并不断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为“守正”；把马克思主义与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把问题作为研究起点，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是为“创新”。我们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解读时代、引领时代，坚持在改革中守正出新、不断超越自己，在开放中博采众长、不断完善自己，进而不断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

知行合一是中国哲学的重要命题，尤其以王阳明知行合一观最具代表性，对个人修养的养成也最具积极性。

即知即改，关口前移

理解王阳明知行合一观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当心中有不良之念时，要赶紧克倒，做到即知即改。虽然只是“心动”，但王阳明认为已经是“行动”了。他指出：“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

一般而言，一个人往往不是一下子就做出恶行的，通常是之前生发出了多次不良之念，但是自身又认为这仅仅是“念”而没有“行”，不加克制，结果这些“不良之念”日益膨胀导致蒙蔽良知而去“行”。因此，人不仅要控制自己的行为，更要经常反思自己的内心，重视和遏制滋生不良想法的“苗头”。这个主张比人们通常认为的“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更提前了一步，从思想上来控制恶行的发生，可谓关口前移。在王阳明看来，儒家讲的“格物”就是“格心”，即通过“为善去恶”的功夫把内心的“恶念”格掉，所以王阳明说“为善去恶是格物”。他指出：“今人学问，只因知、行分作两件，故有一念发动，虽是不善，却未尝行，便不去禁止。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须要彻根彻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根据王阳明的观点，一个人想提高自己修养，就不仅要注意自己的言行，还要注意自己的思想，心里一旦有“恶念”萌生，赶紧进行自我控制将其克倒。

儒家认为把“恶念”克倒的重要方法是慎独，王阳明也非常注意运用慎独的方法。一般来说，慎独

有两层含义，一是在没人监督的时候不犯错误，即“不欺暗室”。这就是《中庸》中所说的“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能不能做到慎独，也是君子与小人的重要区别。因为“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二是“不自欺”，就是在没人监督的时候不仅不敢犯错误，而且根本就不想犯错误，做到既不欺骗别人，也不欺骗自己的良心，所以“慎独则心安”。因此，一个人要提升修养，必须养成慎独的习惯，在公开场合或个人独处，都要行为端正、表里如一、保持定力。

即知即行，真知真行

理解王阳明知行合一观的另外一种情况是当心中有“善念”时，应赶紧行动，做到即知即行。在王阳明看来，只有“真行”才是“真知”，“知而不行，只是未知”。

王阳明认为，每个人都有良知，甚至连盗贼也有良知，但是有些人不愿意按照自己的良知去做，实际上不是“真知”。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观在当时有极强的针对性，在明代，程朱理学强化了“存天理，灭人欲”等伦理道德，对士大夫也提出了很多修养要求，时人确实能够把“天理”与“人欲”要求的道德范畴了解得很清楚，但不少人却知而不行，甚至行而悖知，脱离了儒家经世致用的精神。他指出，“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关于知识分子知而不行，重知不重行的情况，清初颜元也曾经批评指出：“宋元来儒者……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即为上品也。”荀子更是非常强烈地斥责“口言善，身行恶”者。纵观历史与现实，真知真行确非易事，需要人不断以学习

观照内心的知行合一观

□ 陈方刘

或反思等方式提高自我认知、提升个人修养及品行，并用以指导行为与实践，这也是达到知行合一的关键步骤。

王阳明认为，道不可坐论，德不能空谈，把“善念”付诸行动从而实现知行合一，需要把“立德”与“立功”“立言”结合起来，这既是中国古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也是实现“内圣”与“外王”有机统一的必然要求。这些观点作为儒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直到今天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中国人的内心世界，以正能量的因子提示着中国人在完善自我、改造社会的道路上求真务实，不尚空谈。



（一）平凡之果

苹果在水果中太普通太平常了，桌子上果盘里摆几个苹果，谁也不会多看一眼，更不会对着它吞咽口水。然而，苹果果真平凡之果吗？其实，从古至今中外、由表及里看一遍：苹果并不平凡。

苹果，古已有之，历史悠久。南朝时期编写的《千字文》中有一句：“果珍李柰，菜重芥姜。”意思是，李子和苹果是水果中的珍品，蔬菜里面最重要的是芥菜和姜。柰就是古代的一种苹果，当时人们就认识到苹果的珍贵。

现代人，一说到苹果，马上联想到三个人物、三个故事——亚当偷吃的智慧之果、砸中牛顿的引力之果——当然，最著名的，还是被乔布斯咬了一口、被整天拿在手上的科技之果。这三个人物故事的传奇性，让人们淡忘了世界上这种承载着推动人类发展、记录着人类认知智慧的传奇水果，原来是如此“普通”的苹果。

苹果还是哲学之果。据说苏格拉底曾拿着一个苹果问学生们，你们闻到了苹果的香味吗？第一次问，有一个学生举手说闻到了。第二次问，又有几个学生举手。第三次问，几乎所有人都举起手，并肯定地回答，真的闻到了苹果的香味。最后苏格拉底告诉学生们说这个苹果是假的，根本没有味道。故事的寓意，有点像中国成语“三人成虎”的意思，从众心理会



让人失去自己的判断。

西方谚语中有：“一天一苹果，医生远离我。”苹果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C、多种微量元素和果胶等，常吃苹果确实有不少好处。从这个意义上说，苹果被称为平安之果是实至名归的。

（二）蒜来蒜去

阳光、空气和水。白生生的蒜头，绿绿莹莹的苗儿。生命源自基本



条件的满足，不需要过多的浇灌和施肥。成长没有那么复杂。

蒜头里长出蒜苗，蒜苗里抽出蒜薹。只要天生我材，无论长成什么样儿都会被人所需、都可被人所用。

蒜辣不仅是一种特殊味道的辣，还是一种入侵性很强的辣。调味儿食品当中，蒜是天然的医生。可以消食、抑菌、清肠、减脂、防癌。有“吃肉不吃蒜，营养减一半”的说法。小儿晚上积食，烧几瓣大蒜让小孩儿吃，非常有效。

大蒜虽有百益而独害目。据说多

生活滋味

李新慧 / 图文



吃会影响维生素B的吸收，对眼睛有刺激作用。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东西是不存在的，哪怕浑身都是宝。

北方人爱吃吃蒜的居多，南方爱吃的也不少。尽管食用后，会有不太好闻的气味，但大蒜仍广受欢迎。不少人吃碗面或米粉，剥上几瓣蒜，咔嚓咔嚓就着，一顿饭吃得心满意足。

也不要觉得吃大蒜很土气。开心麻花拍了个电影叫《驴得水》，里面有个镜头是从大都市来到乡村的女教师，穿着旗袍，抱着一篮子大蒜，一



边剥，一边哼唱着柔情小曲儿。阳光下，女主轻灵素雅，雪白的蒜皮儿随风飞散。原来大蒜可以美到如此耀眼。

（三）烤红薯

红薯和烤红薯，是饥饿和温饱的分界线，是时代变迁的烙印。

不同人眼里，红薯有不同的身份。它曾经是粮食——老辈儿人泛着胃酸的饥饿记忆。是零食——中年一

代香甜的儿时回味。是点缀——当下人们偶尔遇到时尝个新鲜。

过去，为了便于囤积存放，人们把红薯做成各种各样的吃食，切、晒成红薯干儿，做成红薯粉，能吃上一年。

现在，厨师把红薯做成丸子，煎成饼，煮成粥，拔丝、清蒸、油爆，越来越精美。同样的食材，要求高了，口味刁了，时代变了。

红薯，有地方叫地瓜，也有叫山芋或者番薯的。不管怎么叫法，现代人宣扬的是红薯排毒养颜抗衰老等功效——红薯已彻底退出作为口粮的历史舞台。

“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这句流传甚广的北方民谚，一度让红薯维系着官与民，成为俗语中“青天大老爷”的标签，至今也还被人引用着。

寒冷的北方夜晚，如果能吃到一个热腾腾的烤红薯，一掰开蹿出一股甜丝丝的热气——想想都觉得太惬意了。一个大泥炉，里面有火，把红薯往火周围一煨，就可以等着软甜的烤红薯出炉了。把香和甜这两种天然的美味混合在一起——只需要加把火就够了。

